

偶尔从久未启用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张 46 年前的旧机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境内老百姓长途出行从未敢想过乘飞机。当时,乘机限于持有单位介绍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大学里级别最低的小助教,1969 年 9 月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次乘飞机的机会。

9 月 21 日傍晚,系革委会领导突然通知我和黄次栋老师明天中午到延安中路上海民航售票处集合,去机场乘飞机赴北京编写英语教材。

原来为了适应中国民航对外发展的需要,民航上海管理局接受北京总局下达的紧急任务,要立即在上海开办英语培训班,全国各机场航站选派学员来沪集中学习。教员确定四位,两位由北京总局选派,两位由上海管理局向地方高校借调。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我与黄老师被借调到民航上海管理局,担任英语培训班教员,现在是赴京与民航总局的两位教员一道讨论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张同志是民航局内定的英语培训班指导员。

我和黄老师的机票是联票。那是四寸多长、两寸来宽的纸片:第一页印着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照耀着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猎猎飘扬着千万杆红旗;第二页是红底白字的毛主席语录;第三页才是与乘机有关的内容:航程的起止地、航班号码、乘机日期、起飞时间等。乘客一栏里,

第一次乘飞机◆姚祝英



合并写着黄老师与我两人的姓名。票价类别是四分之一,那时沪京航班的全票价是九十六元五角,我们两人的票款合计才四十八元二角,已被当作民航工作人员享受了内部员工的优惠价。

到达虹桥机场后,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频频从通透的玻璃大门窗向外张望,只见停机坪上整齐排放着几架飞机,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机身上亮晶晶的舷窗和周总理的题字“中国民航”都清晰可见。

但是,在候机的一个多小时里,始终未见一架飞机起降,机场显得

空寂静穆。中国民航起步晚,建国之初只开辟 12 条短程航线,直到现在国内用于航班飞行的机场还很少,国际航线就更少。1966 年开辟的从巴黎到上海的国际航线,隔天才有一个航班进出。上海虹桥机场 1964 年虽被命名为“国际机场”,其实名实不符。

终于听到了广播喇叭播报登机通知,乘客们手持登机牌,排着队伍走向停机坪上已架好舷梯的一架英制飞机“子爵号”。时值二十周年国庆前夕,赴京的旅客都已经经过严格审查,所以登机前不再进行安检。我扫视了一下机舱,五六十座位只有三十几位乘客,外国人和华侨倒不少,国内普通旅客大多是身穿制服的军人和民航工作人员。

随着一阵隆隆的震动声,飞机启动了。它慢慢地转身,离开停机坪,在跑道上加速滑行,尔后猛地机身翘起,离地冲天,不断拉高。我有点紧张,不由自主地后仰着身子,体验第一次乘飞机最初那一瞬间的奇妙感受。

待飞行稍平稳,我脸贴舷窗,从空中鸟瞰即将告别的上海:地面像

细针密缕的地毯,蜂窝般密集的房屋、棋盘般的稻田、藤蔓般蜿蜒的公路、银线似的铁道、飘带似的江河和横跨在上的桥梁……渐渐缩小远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微缩景观,有点像巨人国的人在观察蚂蚁国的繁忙。

飞机上升到 7000 米以上的高空,平稳地行进。窗外展现一片清澈透明的湛蓝色,不时飘过几朵莲花般的白云,使我心胸舒展,似有飘飘欲仙的感觉。

机舱内悠然沉静,两位身着灰色翻领上衣、蓝色长裤的空中乘务员(那时不叫空姐)先给每位乘客发一把小型折扇和一包特制的软壳五支装中华牌香烟,上面均印有“中国民航”的字样。尔后,不时给乘客送上饮料(兑水的桔子汁)、饼干、苹果和糖块。她们面带微笑的殷勤服务,使我感到既陌生又亲切,自“文革”爆发以来我在地面上未曾见到过。

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在夕阳西照的首都机场着陆。毕生难忘的第一次乘飞机,开始了我为中国民航英语培训班施教的一段经历。

真是雷厉风行,在北京匆匆编完了第一阶段的两本教材,民航局领导随即安排我们 10 月 21 日返沪开班授课。幸运的是,在首都机场候机时,我们亲眼看到了敬爱的周总理迎接越南总理范文同的庄严场面。

可挂可玩的紫砂壁瓶◆蔡一宁

紫砂器物收藏多了,有时偶遇特殊品种,特别是文房器物中的罕见品,也会欣然解囊。这件紫砂壁瓶就是在朵云轩闲逛时觅到的。它高 15cm,宽 8.2cm,口径 6.6cm,底径 6.4cm,此瓶正面看与一般花瓶无异,长圆腹,收颈,束底,敞口,圈足,形制优美大方,紫砂砂质精良,红中泛紫,发色古雅,包浆十足,圈足右下方钤有一枚篆字方形章,篆字疑为繁体“睦”字(念 lu),作者为谁待考。瓶背面上方有一小圆孔,用以挂钩。壁瓶身上用琅琅釉彩画满了春山仙居图,青绿山水,层峦叠嶂,洲渚烟树,塔寺幽远,桃红柳绿,粉墙黛瓦,俨然一派江南水乡景致,远观

景物粲然,近狎秀色可掬,极富生活情趣和风雅品味。

此瓶无论泥料、形制,还是釉彩和画片风格等均符合清代中期乾隆年间烧造的特征,迄今已有 200 余年的历史了。古董壁瓶一般瓷质的较多见,紫砂胎壁瓶很少,而乾隆年间有款的壁瓶则更难寻。

壁瓶因挂于壁面而名,又叫挂瓶、半瓶、轿瓶,还有称马挂瓶的,是中国文物中一个特殊的分类。据悉,壁瓶造型源于唐宋年间,成熟于明代后期,兴于清代中期。器型常为瓶、尊等一半,常见的有葫芦式、半圆式、莲花口式、瓜棱式等。正面朝外,常绘画片,图案内容不外乎文人喜欢的山



水楼台、松梅兰竹、隐士高人、八仙神通、平沙落雁、折枝花卉等。而靠壁一面一般露胎,平坦有孔,以利用悬挂于书房的墙壁、卧室或轿子上,用于装饰或插画。因器型较小,器身纹饰寓意丰富,亦可把玩赏析。万历时期的《遵生八笺》一书对壁瓶主要功能的描述是“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冬夏两可”。

清代文人因受乾隆帝的影响,对壁瓶更是宠爱有加,诗赋中不乏溢美之词:“衡皋掇青藻,毡室伴清嘉”、“宿再朝烟与润,山花野卉常新”、“动洁路琴秀,静悬屋盎春”。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那间收藏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三件墨宝的书房“三希堂”的墙壁上竟挂了 13 只壁瓶,可见其对壁瓶的喜爱程度。



建华兄的文集付梓了,这本集子,图文并茂,文情并茂,除记载作者与前辈艺术家的交往故事外,还佐以大量人物照片和书画藏品图片,其中不乏一些人所未见的珍品孤品,如大收藏家张伯驹潘素夫妇写赠谢稚柳的书画扇,以及谢稚柳、陈佩秋、程十发、刘旦宅、江兆申、陈逸飞、徐云叔、任重等众多名家馈赠作者的精品力作,为本书平添了许多传奇色彩。通过这本集子,读者看到的不仅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谢定伟

是作者几十年“游于艺”的历程,不仅是近世名家的奇闻轶事,也不仅是书画收藏圈内人喜闻乐见的掌故,这书中的字里行间,分明在泄露着作者与艺术家之间的师徒情长,诉说着作者对书画艺术的一腔热爱。

建华兄自小喜爱中国传统书画,但他自己不书也不画,自称是个“玩家”。但他的玩法,与今天的书画藏家又有着不同。他早年中学毕业后去上海郊区农场务农,回沪后进入机关工作,因缘际会地结识了一批书画名家,方才在海上书画圈“玩”开了。所以建华兄的玩法是先与名家“玩”,再与书画“玩”。他的“玩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唐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在建华兄身上是恰如其分的。从建华兄交往的这些名家,正可以看出其“玩家”的起点与品第之高。在本书的故事中,读者或可以间接地体会到这种“玩家”的无穷乐趣,尤其是与前辈名家的忘年

交,在当下年轻一代中几成绝响,不免使今人有此生恨晚之感慨。

建华兄的藏品多且各有故事,一来是出于画家亲自赠送,二来又常常是出于某种原因而得之,于是就成为故事。大收藏家张伯驹潘素夫妇写赠谢稚柳的书画扇孤品,程十发的“健康发财”双祝图和仕女图,谢稚柳的写意水仙与色彩缤纷的落墨牡丹精品以及书于宫廷手绘仙鹤彩绢之上的七言诗轴孤品,陈佩秋的《水深鱼乐》《西凉葡萄》和《疏影横斜》手卷,还有刘旦宅的《双骏图》扇面与《长恨歌》《洛神赋》书画长卷,陈逸飞的肖像画《老人》等等,不一而足,读者可以细嚼慢咽地品读这些收藏故事。

在酷爱书画之外,建华兄之为人,也是值得称道的。他与老艺术家之间的交往,亦师亦友。无论是前辈艺术家或是同辈友朋,他都如对家人一般,急人所急,解人所难。这类事建华兄在本书中并无着墨,此处

顺便也说一些往事。尽管与谢、陈二老交谊匪浅,但他却从不开口向二老求画;谢老爱吃肉,在病中住院时,建华兄常悄悄带他去爱吃的大块酱汁肉;谢老病重,建华兄在病房里为其擦背;其他老画家们家中事无巨细,他常常自告奋勇帮助操办;朋友患病,他鞍前马后寻医访药。陈佩秋先生曾在赠建华兄画中这样题道:“新春将至,奉上小画乙帧,以此答谢建华海燕夫妇平素高情厚谊于万一,健碧,乙酉冬至。”从这段题跋中,建华兄的交往为人可见一斑。

与建华兄相识二十余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他都已年届花甲,诸多往事,回想起来,似在昨日;而有些场景,早已物是人非。尤其是念及书中有几位前辈名师已经与世相隔,在读过建华兄的文字后,在感受到建华兄的感受之后,终不免遗下无穷的惆怅。

(本文为《名士风流——建华画坛笔记》的序言,略有删节)



一支半解◆徐鸣

有收藏癖好的人出门在外习惯东看看、西摸摸,跟个侦探似的,总希冀有所收获。像我的一位藏友王君,一次偶然路过市区正在拆迁的老房子,就那么随便一兜,结果慧眼一双很快发现躺在上街沿一块无人问津表面蒙满灰尘的石头竟然是块英租界的界碑,漏捡大了。我虽然脑袋硕大却运气不佳,从未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到过。但习惯养成老改不了,实在无可救药。

一日去街道社区医院瞧中医,等待老中医开方子期间,蓦然瞥见办公桌角落横着一支钢笔。因为远望钢笔上面布满花纹,觉得有苗头,就赶紧打招呼捏起钢笔凑近仔细打量:原来是支 24K“英雄儿女”将军牌金笔,笔套上镌刻“八一军功章”图案;笔杆上则是“万里长城”图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人民致敬”字样。

于是我顾不上谈病情了,想方设法同老中医套近乎:“医生依以前参加过军当过兵。”老中医调侃道:“依当我是老军医啊?”不是!不是!我有点语无伦次,快点解释:“我的意思依这支钢笔是部队里发的。对吗?”老中医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一个劲地抱怨:“介旧的钢笔没用了。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机不可失,我趁机献上一计:“本人恰巧多支笔,与你交换,好吗?”老中医嘿一笑,既不答应也不拒绝。我晓得有指望,马上赶紧慢赶一口气跑回家,翻箱倒篋拿出 2 支新笔:1 支 14K 铱金笔,1 支派克圆珠笔。重新奔回社区医院,诚心诚意对老中医讲:“既然你的那支钢笔坏了,扔在旁边也是扔,不妨做个人情送给我。我呢平时闲着专门收藏铅笔、钢笔之类的玩意。这 2 支新钢笔你可以随便挑 1 支,让你写病历签名字。”我的诚恳打动了老中医,结果当然是如愿以偿。

“军笔”到手后我上网百度,要探究一番这支“英雄儿女”将军牌金笔的来龙去脉,这又是我的习惯。没料到一无所获。网上仅仅是挂出几支一模一样的钢笔的拍卖价,背景还不如我知道的多。根据我在制笔企业工作过多年的经历,晓得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上海几家金笔厂曾经生产过 100 万支钢笔慰问志愿军将士。但这支钢笔显然不是,因为笔杆上面没见“最可爱的人”字样。而该“八一军功章”图案也和正式颁发的勋章和奖章的图案不同。再从钢笔的牌子推测,如果说“将军牌”是发给一定级别的干部,我瞎寻思那老中医似乎不太像(贸然打探人家过去详细履历不礼貌)。

由于水平有限,我仅仅解出答案的一半。另外一半只好拜托各位专家了。